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ZHONGGUO NONGCUN YANJIU SHUXI



决裂

——新农村的国家建构

江汉平原中兴镇的实践表达（1949—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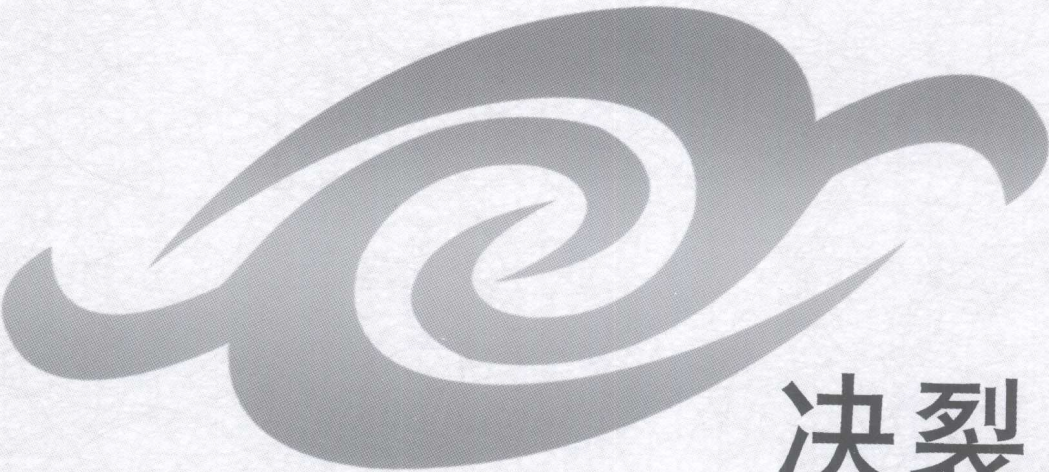
吴 淼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ZHONGGUO NONGCUN YANJIU SHUXI



决裂

——新农村的国家建构

江汉平原中兴镇的实践表达 (1949—1978)

吴 淼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决裂：新农村的国家建构 / 吴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6310-8

I. 决… II. 吴… III.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808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 卿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ZUOZHE JIANJIE

吴淼（1975—），男，苗族，湖北利川人。200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理论专业，同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教书营生。学术兴趣广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中国乡村变迁等，曾以《村民自治在乡土社会的遭遇》（合作）、《大故事中的小逻辑》、《选举权的村庄意义》为题发表学术作品若干。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

- 湖村经济
- 山村经济
- 平原经济
- 城乡经济

策划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本书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211 工程”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资助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 勇

副主编 项继权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石 挺	刘 菽红	卢福营
邓大才	宋亚平	李德芳	吴 琦
吴理财	项继权	徐 勇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曾菊新	董江爱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年前后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新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2000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到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识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 委 会
2005年5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皇权”下县：体制性政权的扩张	(21)
一 行政化与“武化”：外力冲击下的乡村秩序	(21)
二 党员渗透与军事斗争	(29)
三 底层动员与武力镇压	(33)
四 政权扩张的方式与逻辑	(39)
第二章 剥夺“剥削者”：乡村社会的重构	(43)
一 土改工作队与乡村伦理	(43)
二 扎“根子”与垒“圈子”	(50)
三 没收财产与抽肥补瘦	(56)
四 国家政权基础的再造	(63)
第三章 组织起来：被简化的农民积极性	(68)
一 换手抓背：互助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强制	(68)
二 全党办社：行政力量的推动	(74)
三 批判“小脚女人”：来自中央的压力	(82)
四 生产组织的政治构造	(89)
第四章 大跃进：被淹没的乡村	(94)
一 高指标与农业“革命”	(94)
二 公社化：政权的全面扩张	(100)
三 修漳河水库：改天换地	(107)
四 公社食堂：供给制的尝试	(112)
五 灾难：不仅仅是饥饿	(114)

目	六 国家膨胀的极致	(122)
录	第五章 集体化：国家与农民的较量	(126)
	一 不准包产到户：大集体的固守	(126)
	二 粮食上纲要与农业发展	(134)
	三 基层干部包村驻队	(140)
	四 粮食政策：国家主导与乡村变通	(146)
	五 刚性制度与柔性运行	(158)
	第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乡村主体的重构	(162)
	一 “封建迷信”复活：顽强的“小农”	(162)
	二 社会主义教育：以诉苦的形式	(174)
	三 破“四旧”：在学习“语录”中进行	(182)
	四 赶吊死鬼：发生在“批林批孔”中	(190)
	五 “保守”的乡村	(194)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乡村秩序的政治建构	(199)
	一 阶级的淡化：政治化的衰退	(199)
	二 重振阶级斗争：巩固“革命”成果	(208)
	三 阶级斗争的工具化运用	(215)
	四 “大社员”向杰华：反思阶级斗争的成效	(226)
	五 政权化的乡村秩序	(231)
	第八章 清洗与教育：乡村权力的非制度化规制	(237)
	一 反“五风”：乡村干部对国家的疏离	(237)
	二 集训：“公仆”的塑造	(248)
	三 “四不清”：乡村干部权力的滥用	(253)
	四 “洗手洗澡”：国家的策略与无奈	(260)
	五 夹缝中的基层干部	(269)
	结语：新农村与乡村自主性	(274)
	参考文献	(287)
	小人物“演义”（后记）	(297)

引言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兴镇，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社会的宏观变迁。美好的社会模式通过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管道输入乡村，按照现代化的理想对原有秩序进行解构和重构，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模式被无情地批判而“他者化”以使其与历史“决裂”。基于国家偏好的“新农村”不可避免地对乡村认识的简化和利益的遮蔽，以建构理性支撑的话语霸权必将对以实践为根基的乡村“米提斯”残酷地挤兑和压制。当生活甚至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以土地和传统资源为生的乡村民众，必然在体制和话语的夹缝中寻找出路，以农人的智慧耗蚀着国家的改造，使实践的“新乡村”呈现出巨大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但是，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国家认为这无疑是“倒退”和“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而不可容忍。于是，便自上而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以重振乡村的革命激情。在 1949—1978 年的体制性政权主导的乡村秩序中，始终存在着农民与国家多层面的持续博弈。这种博弈过程，既决定了国家改造乡村社会的独特进路，更对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变迁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社会的发展具有突变性。19 世纪中叶，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随之而来

引言

的割地、赔款等屈辱“礼遇”下慢慢“眼睁看世界”。中国对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从开始的器物上的“奇技淫巧”之斥，逐渐到以“师夷制夷”的“中体西用”，再到后来的“立宪救国”的“清末新政”，直到最后将西方浓缩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全民族为之倾倒甚至浴血奋战。工业化成为中华民族富强的唯一希望，现代化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居于整个社会的话语霸权。当以西方社会为模板的现代化日趋居于主流和中心地位的同时，依托于农耕的整个中华几千年文明则逐渐被“他者化”，受到日益激烈的批判和否弃。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冲击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但是直到上个世纪初，国人振兴中华的努力几乎都是从宏观和体制着手。分散而广袤的乡村尽管不断衰败，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危机的加剧，农村对于整个中国的重要性才日益彰显，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于是，通过乡村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和“民族自救”（梁漱溟）成了中国的希望和乡村行动的动力，也是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掀起乡村运动的重要原因。乡村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相互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巨大，但总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大类：一是所谓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上由民间力量组织和实施，晏阳初和梁漱溟是其主要代表；一是政治变革，包括国民党的保甲制和阎锡山的村本政制。

应该说，最早感受到乡村危机并奋力拯救的是河北定县的乡绅米春明，他以1904年建立新式学堂为肇始，制定并实施了多

^①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转引自丁长青：《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国家、市场与农民》，《史学月刊》2004年12月。

项以加强乡村秩序，净化风俗为目的的措施。后来，米春明留学回来的儿子米迪刚继续推进其父业，在借鉴日本町村制度的基础上，对乡村管理模式进行了变革，对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诸多改进，以发展乡村经济来提高乡民的生活。

如果说米氏父子对河北定县所进行的变革，基本上是对传统乡村秩序修复和加强的话，那么以饱受西方文明浸淫的晏阳初为核心的平教会则对农村的现实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以西方社会为借镜，晏阳初认为虽然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问题却“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穷、弱、私”。^①基于此，解决农村的问题关键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用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除文盲，作新民”。在晏阳初看来，中国农村不能自我解救，必须输入外力去教育改造民众。

梁漱溟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乡村建设运动。在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为特殊的中国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就是社会构造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②他希望“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将中西文化“沟通调和”起来，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并“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实现“从农业引发工业”，从而复兴中华民族。作为文化特殊论者和以农立国的梁漱溟^③，既注意到了乡民个体素质提高的必要，又努力去重组社会结构，希望从总体上解决乡村问题。

①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③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引言

面对中国乡村困窘的形势，政府除了为民间乡村建设运动提供各种方便和支持外，也从政权的角度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革以维持乡村秩序。早在“清末新政”时期，通过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建立了乡村董事会，废除了传统的保甲行政区划而推行警区分划，推行“自治运动”。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付共产党的扩张，加强了对乡村的控制，“自治组织中之间邻亦废止，而替以保甲”，并且“按户编丁，农隙讲武”^①，以团防的名义，在乡村推行严密的保甲制度，以达到“稽查匪类”、“捕拿匪盗”、“严防反革命煽乱”的目标。民国乡村体制改造，主要是为了稳定政权，将乡村纳入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中。

除了中央政权实行的乡村变革外，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当时最有影响的是阎锡山推行的村政建设。自1917年任山西省长后，阎锡山颁布《县属村制通行简章》，以“新政运动”的形式编村为行政单位；加强了对乡村的管理和控制。后来，阎锡山又认为，要“使村制组织完全，俨成有机活体，凡村中所能自了之事，即获自了之权”，放弃借鉴于日本町村的村自治，实行“村政”。尽管“村政”希望实现乡村自治，但作为政府的一种乡村制度设计，是严密和行政督导下推行的，各地村治活动属于压力型或外生型。^②

从以上的简短综述可以发现，在20世纪前半叶（尤其是30—40年代）不同组织对乡村所从事的实践，尽管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到变革的理论资源和希望达到的“理想彼岸”，再到具体的实践措施都有巨大的差别，但在深层次上却有诸多共通之

① 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纪要，转引自王先明：《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② 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处：其一，都认为传统的乡村受到冲击而处于衰败之中，需要进行拯救。至于乡村社会破败的性质和原因，以及乡村的出路则各有不同。其二，都对乡村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尽管多数人和团体并不一定完全赞同如晏阳初那样对整个乡村社会的彻底否定，但是乡村缺乏内生的自救力量，需要如知识分子去组织和教育则是基本的共识。其三，基于理想设计的模式是乡村运动的范本和归依。无论是梁漱溟对传统文化美好的怀念，还是晏阳初、阎锡山对日本町村制度的模仿，甚至蒋介石保甲制的重建，无不是对乡村的建构和塑造，乡民成了被改造的客体。其四，复兴乡村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到更宏大的理想。乡村运动的发起和滥觞都是在中华民族内外交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①，被赋予复兴民族、拯救国家甚至巩固政权的宏大意义，其本身也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各种乡村运动或由于日本的侵略，或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最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成为历史。这些实践到底取得了多少成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究竟有何贡献？学界虽无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基本结论却是否定性的^②。既使当时满腔热血投入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也无奈地感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③。在这里，应该注意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怎样看待宏观历史变故对微观实践的影响；二是如何从微观的角度对宏观事件进行解释。就前一个问题而言，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和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② 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

^③ 梁漱溟：《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引
言

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去证明这些实践的失败。反过来，又以乡村建设运动没有使中华民族免于外敌入侵和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用阶级的话语指责这场运动没有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社会进行整体性的改造，它的妥协、软弱和不彻底性是失败的根源。排除时间和时局因素的考虑，要对这场运动的得失进行冷静估价需要全面而客观的事实和数据，笔者无意也无能参与讨论。笔者想要追问的是，如果说这场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惯常的“阶级分析法”外，梁漱溟所总结的乡村运动“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是否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局面。然而国际上的独立并没有实现国内的富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依然没有完成，乡村社会相对于城市依然处于衰落的境地。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这种改造既延续了战争年代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秩序的结构性改造，也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对改造后的社会进行了彻底重组。整个乡村改造和重组抛弃了乡村运动渐进的改良作法，在“革命”的话语下通过阶级斗争以运动的方式展开，乡村完全成了被动的改造对象，而不是一个能动的主体，这是一种典型的斯科特意义上的“社会工程”。这种社会工程实际上是建国前外力改造乡村社会的延续，只不过这时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支持，乡村被有计划的、系统的改造，但是乡村所处的地位及改造的逻辑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社会工程何以能够展开？其演展的逻辑是什么？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果这种改造是成功的，为什么这种方式会被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所抛弃？为什么当前的中国仍然存在被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如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种革命式的改造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共同弊端是什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到底如何发展？这些问题不断缠结

着中国的现代化，困惑着学术界。正是基于此，笔者试图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探索。

（二）

作为农业大国，乡村和农民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显然不容低估。虽然诸如“中国问题原即乡村问题”，“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①之类的结论并非每个人都会同意，但是，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乡村是绕不过的坎。正是这种原因，乡村社会及其变迁始终是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大批优秀的著作也不断涌现。这些优秀的成果已经被人从不同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②。笔者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围绕乡村社会在外部力量（尤其是国家政权）主导下变迁过程这一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检讨。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了中国乡村的变化，并从学术的视野进行研究。在其具有“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③，通过细致地描述江村社会生活、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了市场、政权等外部力量如何侵入乡村社会。在该书中，费先生对国民党政权在乡村社会推行的保甲制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生版，第624页。

② 参见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3页；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页；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3页。

③ 布·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的评价，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